



高洛日报微信公众号

高洛日报客户端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建文)“像这种有虫害的玉米苗,要注意打药的方法,得从下往上打,才能更好地控制虫害……”6月7日,在洛南县石门镇王桥村、石城镇王村和郝坪村、城关街办窄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省市核心区示范区、种植模式和土豆新品种筛选试验基地、新型经营主体粮食生产规模经营基地马铃薯套种玉米黄芸豆套种种植基地,一场田间管护现场培训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市农技站科技特派员粮食产业技术团队成员就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新品种、马铃薯套种玉米黄芸豆套种种植施肥管理作现场示范和讲解。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围绕茶叶生

产、畜牧养殖、食用菌种植、中药材种植等农业主导产业,接收、选派多名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讲解、电话咨询等多种形式,手把手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解决企业和农民实际生产难题。通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模式,传授推广新技术,帮助解决各类技术难题,为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助力乡村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特派员田间地头调研指导,查看大豆玉米长势、受旱情况、种植密度及田间管理情况,指导农技人员和农户加强试验示范田的管理,及时组织除草和玉米苗期追施速效氮肥,对机播缺苗断垄的及时移栽或补种,确保种植密度达到技术规范要求。

寻找“邵队长”

屈超耘

军区副司令员当年在孙家山开辟根据地情况,他说那人是“邵队长”邵吉,外调人员纠正不是邵而是程,从此他才知道,所谓的“邵队长”误传为邵吉,责任全在他。辞别王柏桢,我立即打电话到湖南省军区,对方告知,副司令员程敬文同志已离休,他原来是少将军衔,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为了方便工作,对方还把老将军家的电话告诉了我。几天后,当我拨通电话时,接话人正好是程敬文将军本人。我提出孙家山父老乡亲希望老人家重返故地时,老将军深情地回答:“离开孙家山50年了,我太想那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你们安排吧,我一定按时回来。”

好,真好!1961年开始我多年想找的“邵队长”终于要回孙家山了,作为小辈的我多么地高兴,期望早日能见到老将军的面。我甚至像小孩一样,盼望月亮和太阳能轮换走得快些更快些。

“邵队长”,不,是程敬文老将军终于于1984年8月的一天,如约回到了丹凤县。风尘未扫的他,便决定第二天去孙家山。考虑到他既是高干又是年过七十的老年人,县上要派小车送他,却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我虽然年岁大点,可身体还结实着,还是步行去好。”我们试图劝服,说:“从龙驹寨到孙家山,要走几十里的山路,你怎能吃得消?”他说:“不怕,想当年我和王柏桢同志见面,走的就是山路;和张虎森团总约谈也是走的山路。现在我要重新走一次山路去孙家山,试一试自己的手脚还行不行。”

恭敬不如从命,最终还是按照老将军的意愿办。我们从县城北边一个叫白土梁的小路起步,老当益壮的程老将军一开走就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走曲曲弯弯的山路如履平地,不到半个钟头,就把我等年轻人甩在了后边,大家只好加快脚步才能跟得上他。中午11点,到达孙家山山顶,老将军像个孩子似的,高声地呼喊着:“孙家山,我回来了。离开你50年,我真是太高兴了。”由于激动,老将军的眼圈也随之红了起来。

程老将军刚到目的地,1934年他发展的党员孙继维、周显常就激动地迎上前,拉住他的手说:“邵队长啊,你回来了,我们多想你哪,今天总算见到你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50年了。”老将军也说:“50年了,当年咱们还是小青年,如今都是老年人了。”说毕,他突然问道:“今天怎么没见贺同志,他那时可是你们的头儿哪?”孙继维回答:“贺正源同志真可怜,自小分队离开后,国民党的军队就把他拉到龙驹寨,鞭子打不说,还上了老虎凳。可他硬是一句话都不说,敌人无奈放他回来,光养病就用了一年多。”周显常补充说:“正源病都死10多年了,他临死时拉着继维和我的手说:‘我多么想邵队长,可惜找不着他。’”说到这里,程老将军竟早已泪眼婆娑了。由于他们当事人在哭,也感动得我们这些陪同人员跟着哭。这哭,与程老将军在孙家山山顶的眼圈发红不同,前者是心情激动,后者是痛失革命战友的伤心和悲痛。

在孙继维、周显常等和程老将军座谈期间,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贺、孙、周多次向党组织申请,说他们3人是1934年“邵队长”发展的党员,只因为没有有效证明,没有得到党组织的认可。听

到此,程老将军立即严肃地表态,向陪同的丹凤县委负责同志说:“贺同志和孙、周二位同志,都是我在孙家山时亲自发展的党员,我今天当面证明。”之后,他又讲了当年和贺正源扮作小商贩到商州一带寻找大部队的故事,他说:“为了保险,由贺同志应付敌人,我自己扮作哑巴。”我插嘴说:“你为什么扮作哑巴?”老将军瞪了我一眼:“我是湖北人,说的一口下湖话,不装哑巴不是露馅了吗?”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

座谈期间,王柏桢的弟弟王柏桢提到了数十年传说的“邵队长”是谁的问题,老将军回答说:“我当年在红二十五军,因为年龄小,被任命为少共书记。到孙家山开辟工作时,小分队成员便叫我‘少队长’,是‘少’不是‘邵’,因为百家姓没有姓少的,便被你们当地人误以为姓邵了。实际上‘邵队长’不对,‘少队长’也不对,真正的队长是本人程敬文。”也就是从老将军这次重返孙家山起,50年的“邵队长”“少队长”之谜,终于在商洛山正式解密了。

程敬文将军这次重返阔别50年的孙家山,还有一个夙愿,就是寻找当年在五谷崖红军小分队集体拜下的干女儿。那是在来孙家山不久进行的一次访贫问苦活动中,来到赤贫户刘老汉家。老两口60多岁,儿子出外干活,儿媳在生产队时大出血而死,老两口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孙小女。当天,正是孙小女一周岁生日,当地人叫“过岁”。按老风俗,这一天大人要抱孩子出门“撞干大”,撞上谁谁就是“干大”。当时刘老汉抱着孙小女刚出门,恰巧碰见“邵队长”来慰问,便要他当“干大”。他蒙了,自己刚到20岁,连媳妇都没有,怎么能给娃当干大?再说,红军有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允许干这种事。于是,他解释不能当干大的原因,可刘老汉硬说祖先留下的老规矩,绝对不能违犯,说着就叫刚学会挪步的孙女给他伏地叩头。这一下可把“邵队长”难坏了:不认吧,不利于军民关系;认吧,纪律不允许。最后,他召开党支部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为了能在孙家山顺利开展工作,这干大一定要当。不过,不能是某一人当,干大应该是红军小分队集体。到了第二天,“邵队长”,不,是程敬文领着党支部班子成员又来到刘老汉家,给老人说正式当这个干大,为表示干大对干女儿的祝福,特地给干女儿一块银圆。后来,小分队离开了孙家山,再没有和刘老汉一家联系过。50年后的今天,程将军重访故地,他希望能见到刘老汉一家,特别是想见到他们小分队的干女儿。出发前,他就给了我100元钱,说如果见到已经50岁的干女儿,就把这钱送给她,表示他作为长辈的一点心意。

在孙家吃完午饭,老将军便向孙继维、周显常提出,要他们陪同他去五谷崖刘老汉家。孙、周告诉他,五谷崖的刘老汉早已死了。程将军急切地问:“那位红军小分队的干女儿还在吗?”孙、周二位说:“小分队走后第二年,那位红军的干女儿就活活饿死了。”

“娃儿饿死了?”

“饿死了!”

老将军一听这话,脸上阴了起来,半晌说不出话来。作为陪同者,我们给老人家宽心:“程司令,你的心思我们全知道。不过你要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饿死的小孩何止千万,你就不要太难过了。”经过一番劝说,老人家的情绪才恢复了常态。

巧合,巧合。世界上常有巧合的事情发生。就在程老将军从孙家山返回丹凤县城的当天晚上,大概快到9点多钟,宾馆的人进来,说有一个年轻女人要见程司令,问叫不叫进来。老将军说:“叫进来,能来找我我就是有事。”当时一个约莫30岁的女子走到老将军的面前,哭着拉住老将军的手说:“邵伯伯,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爸因找不到你,死时眼睛都闭合不上。”老将军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见状有点木然,连忙说:“孩子,别哭,你爸是谁呀?”年轻女子说:“我爸是贺正源哪,我名叫引娥,听说你要回来,继维叔和显常叔写信叫我回来见你。邵伯伯,我的爱人部队转业到嘉峪关工作,我们现在都在那

里定居。”接着,两位从未见过面的人,便一问一答拉起了家常,显得十分亲切。当引娥说到红军小分队离开孙家山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拉去几乎致死,老将军又一次流出了伤心的眼泪。说话当儿,引娥要把带来的礼物送给“邵伯伯”,老人坚决不收,说:“这礼物要是你们孙家山的特产,我收,别的地方的不要。”我们几个陪同人员连忙打圆场:“引娥早就定居在甘肃嘉峪关了,嘉峪关的土特产对她来说,和孙家山是一样的,你就收下吧!”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老人这才收了引娥的礼物。接着,老将军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陪同的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把他事先交给我的100块钱拿出来给引娥,她说啥都不要,三番五次地把钱给老人手里塞,弄得老人真的发了脾气。这时,我猛然想起红军小分队在五谷崖给刘老汉孙女当干大的事,便对引娥说:“你把老人家的这份礼也收上。这份礼本来是老将军准备给当年孙家山的干女儿的,不幸的是她死了,巧的是,你是贺正源的女儿,程司令和你爸又是当年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你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当年小分队的集体干女儿,以这样的身份,你就应该把这份礼收上。”在场的人听我这么一说,都异口同声地道:“引娥,你收下吧!”就这样,作为红军小分队的干女儿,贺引娥这才收下程敬文将军的100元钱。

孙家山之行,我和程敬文老将军走得更近了。期间,他把当年开辟根据地的前因后果,事无巨细地讲给我听。作为专业党史工作者,我自然十分感动。出于工作的需要,时任洛地委党史办主任李文实和我约定,由我执笔,两人共同署名写篇纪实文学,这就是后来公开问世的《“邵队长”传奇》。稿子写好后,由我专程赶赴长沙请老人家审定。1985年春天,我如期第二次见到了老人家。按说我应该住在军区招待所,可老将军却不同意:“你虽然是因公,但我们爷俩已经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我这里的三层楼房只住了我一个老汉,咱们住在一起,既食宿方便,又可以随时交换对稿子的意见。”接着,他又哈哈大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虽然比我大儿子年龄大些,严格说是同辈人,咱俩交谈起来既亲切又方便,你为啥要舍近求远?”见老人诚心挽留,我高兴地答应了,这一住就是整整一个星期。白天,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邵队长”传奇》,晚上,就纯谈他个人的家长里短。他告诉我,他和妻子感情极好,只可惜她因病去世,自



1984年8月,程敬文将军与随行人员在孙家山合影。前排左四为程将军。(刘逢生 摄)



程敬文将军

“邵队长”是谁?有人说是一个姓“邵”的队长,有人说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队长。不管是“邵”还是“少”,我从1961年就开始找他,直到1984年把他找见,这才知道,“邵”也不对,“少”亦不对,他真正的姓是程。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哪!

1961年,我在“商县新志”编写办公室工作,负责“大事记”部分。彼时,丹凤县撤销,龙驹、商镇、庾家河三个公社归商县管辖。著名革命先烈王柏桢是商镇公社显神庙村人,县志的“大事记”要记载他的事迹是必然的事。从搜集的材料证实:早在1934年秋末,为策应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商洛山区,中共陕西省委派他返回故乡配合开展工作。返回后,他发现在龙驹寨北边有个叫孙家山的地方,活跃着一支红军小分队,其领导人是位叫“邵队长”的青年干部。当时龙驹寨驻守的民团团总叫张虎森,他的团副于进剿孙家山的革命根据地时被打死,张虎森正杀气腾腾地准备报复,要把小分队赶出孙家山。王柏桢了解张虎森,他既不是顽固的反共派,且为人有讲义气重承诺的一面,就从中牵线搭桥,使得“邵队长”和张团总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从而使孙家山红色根据地的工作得到十分顺利地开展。

因为要写这一段重要史实,首先得把红军小分队的领导人搞清楚。其时,距离“邵队长”撤离孙家山已经24年,距离王柏桢牺牲也已21年之久,要知道“邵队长”的情况,只有找王柏桢的二弟王柏桢同志。这年夏天,在龙驹寨一家县办工厂,我找到了王柏桢,但对“邵队长”,他只是听其兄说过,却并没有见过面,只依稀记得,“邵队长”的名字叫邵吉。之后,我写信给有关军队单位,询问邵吉其人,回答都是“查无其人”,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把“邵队长”定名为邵吉写进“大事记”里。

人常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三转两不转又把我转到了丹凤县。1984年春,我被任命为县委党史办负责人,任务是征集编写党史资料,当务之急,就是要写红二十五军小分队在孙家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事,而要写此事,又遇见“邵队长”到底是谁的问题。于是,我只得又一次去找王柏桢同志。谁知他一见我就说,几十年前他说的“邵队长”是邵吉,记错了,实际上是姓程。我问原因,他说,“文革”中湖南省军区外调人员找他,调查

